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张溥论“二潘”之比较研究

科目编号：ULSZ 3078

学生姓名：郑丽莲

学位名称：文学士（荣誉）学位

指导老师：余曆雄 师

呈交日期：2015年11月26日

本论文为获取文学士荣誉学位（中文）的部分条件

目次

题目	I
宣誓	II
摘要	III
致谢	V
绪论	1
第一节 选题意义	1
第二节 前人研究结果	2
第三节 研究方法	4
第二章 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看其文学思想	6
第一节 张溥的文学复兴运动	7
第二节 张溥择“二潘”为《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之因素	11
第三章 从张溥的视角看潘岳与潘尼的比较	14
第一节 张溥论潘岳与陆机的品行差异	14
第二节 张溥论潘岳与潘尼的生活际遇对比	16
第四章 张溥对潘岳与潘尼的文学作品评价	21
第一节 潘岳的哀诔之文	22
第二节 潘尼对人品的叙述文章	27
结语	32
参考文献	34

张溥论“二潘”之比较研究

宣誓

谨此宣誓，此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论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文字、电子资讯或口述材料，皆已于注释中具体注明出处，并详列相关的参考书目。

签名：

学号：12ALB06742

日期：2015 年 11 月 24 日

摘要

晚明时期，张溥与同道中人创办了复社，其是该社的领袖家及社会活动家，也是《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的作者。此文集收录了汉朝至隋朝 103 位作家的作品，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重要的诗文总集。张溥所作的这些题辞对学术界带来了巨大贡献，内容是关于他对汉魏六朝文学其中 103 个作家的文学思想评论。通过分析题辞的内容，除了展现出张溥在题辞中所运用的人物批评方法有对前人批评方法的继承，也有注入自身独特的见解与文学思想，可见其写作功力的深厚。张溥处在晚明的一个交替时代，通过此文集的撰写，他极力地推崇汉魏六朝文学的思想，对此文学复兴运动下了非常大的功夫，为当时的学术界注入了新生命，使当时的文学局势显得更多元化。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所收录的潘岳与潘尼乃是西晋著名的文学家，尤其是潘岳其人与其文争议最多。史书《晋书》所载的潘岳形象有“性轻燥、趋世利”、“乾没不已”的特征。然而，其文学成就却拥有很高的评价，尤其是善于书写哀诔文及诗词歌赋。另外，潘尼的作品研究在数量上固然是不多，其文学水平较同时代的潘岳也有一定的距离。不过潘尼文学篇章多提倡雅正、安身立命之道，况且其在道德操守行为上表现正义，深受儒家文化思想，在形象方面与潘岳有很大的差异，而这符合了张溥的理想人格。为此，这使得张溥将“二潘”作为其文集里西晋文人代表之一，除了彰显出张溥所推崇的复古运动，亦表达了他本身的文学思想。

本论文将以张溥的文学思想为首去探讨其笔下的“二潘”，通过《潘太常集·题辞》与《潘黄门集·题辞》之比较，除了表达张溥自身的文学思想，矣探讨其眼里“二潘”的特色，及对他们的看法，最后以他在题辞中对二人文学作品的评价，表现出潘岳与潘尼文章的特点。

关键词：张溥；题辞；汉魏六朝文学；二潘

致谢

这次我的论文可以在指定的时间内顺利完成，令我感到十分的欣慰。首先我要在这儿感谢我的论文指导老师——余曆雄老师。余老师给了我很多的指导和帮忙。在我写论文的过程中，我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尤其是无法定下明确的题目和主论点。因此，很感谢老师细心的指导，多次耐心的为我解惑，真的很幸运能够由他来指导我的论文。与此同时，在文献和书目方面，我也面对了很大的阻碍。除了得到余老师的帮助以外，拉曼大学的图书馆帮我解决了这难题。学校的图书馆大大提供了很多文献及书目，图书馆工作人员也不犹豫的给予我帮助。

经过这次的论文研究，让我更加深入的了解文学，甚至还领悟了历史代代相传的文学文化历史，前人所留下的智慧和精神是值得我们后人景仰和学习。在埋头苦干的这些日子里，我身边的朋友也给予我很大的关怀和帮助。当我面临困扰或压力时，朋友们都不会忘记提醒我多休息，有时候甚至要求一同写论文，他们说这样会更有推动力和激励。

最后，我也要感谢我的家人无时无刻拨电话给我，问候我近况，担心我的健康和饮食起居。总而言之，我要再次感谢在此次论文中帮助我的每一个人，我相信言语和文字都写不完我对他们的感激，可是我心中是充满无尽的感恩和喜悦的。

第一章 绪论

在晚明时期，前后有不同文学学派围绕着“复古”与“革新”的文学主张，为此他们都展开了争论，各学派都提出了他们的文学理论。天启崇祯年间，张溥高度推举汉魏六朝文学，这种转变也预示着将改变明末得文学文风，从而开启了文学复兴运动。而张溥所编写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正是那时候文学风貌转变的一种表现。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反映出他的复古思想理念，另一方面我们也能透过此百篇题辞感受到张溥借复兴汉魏六朝文学以重振晚明学风当时各派的争议风潮。

此文集富有张溥精心撰写的题辞，这百篇题辞不仅是关于汉魏六朝文学史上的众多作家评论，且也能够让世人从中了解汉魏六朝文学的发展时段与历史。张溥运用其独特的视角对笔下百位作家进行评论及批评，他注重一个人的道德品行，而文学作品则居次。通过探讨张溥的这种批评倾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张溥本人的文学主张与思想。百家文人里当中有潘岳与潘尼二人，“二潘”被选入张溥所编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乃是因为他俩所身处的西晋时代必选这二人的原因。因此，本人所要研究的论文专题，便是张溥对“二潘”的看法及其在评价二人时的意义。

第一节 选题意义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在收录与整理汉魏六朝众多作家作品集，为研究汉魏六朝众多作家提供了史料参考，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因此，可说《汉魏六朝

《百三家集·题辞》是一部诗文总集，也是一部史料参考书。笔者选择张溥为此论文对象是因为张溥做了前人不感兴趣的复兴汉魏六朝文学运动，这算是在当时学术上的一个突破。而且，张溥在题辞中将自身的批评看法注入了篇文中，为此诗文总集增加了更有意义的价值。

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所撰写的题辞，篇幅约百字左右，虽篇幅不大但是却为人们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意义。另外，文集里的题辞也可作为探究张溥在为汉魏六朝文学家作题辞时，从张溥的角度看他的文学思想。在西晋汉魏六朝的文人里，无人不知晓“二潘”、“二陆”等，而本论文将会从这部诗集里头的“二潘”作为切入点，从中看出张溥的文学思想及在评价他人与他文之标准。

潘岳与潘尼二人，身为汉魏六朝时期的著名文人，两人的文学成就与人格问题有一定的落差。我们都晓得潘岳在文学作品上有着骄人的成就，擅长诗词歌赋与哀文，然而其世俗心重，谈功名利，对比起潘尼的正面形象有很大的出入。潘尼拥有良好的政治觉悟，无论是在性格、文学创作上都显得较谨慎及收敛。张溥透过两人的差异在题辞中对于他们的生平、文学成就及道德品行表达出其独到的看法与评价，从中我们也能够深入地了解张溥的文学复古思想。因论本文研究将以《潘黄门集》与《潘太常集》为切入点，从张溥的视角去看他眼中的“二潘”。

第二节 前人研究结果

对于张溥所撰写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笔者发现学界甚少人关注张溥在每家集前所精心撰写的百篇题辞。他们主要是从历史资料方面下手，对汉魏六

朝百位文学家的作品及他们的文学成就进行整理，忽略了题辞本身的内容与其意义价值。

首先，殷孟伦为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作注，可说是在学术上第一本专门研究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的理论批评著作。此书对百篇题辞一一详细作注解，考据详实，史料十分丰富。这对后世之人在研究明朝的文学和汉魏六朝的文学家带来了很大的参考价值，在学术上具有深层的意义。除此之外，书中的注释部分也对张溥题辞的行文提出疑义，指出张溥行文之纰漏，艺术成就极大。

（殷孟伦，1961：1-312）

接着，钟涛也在其《张溥文学思想管窥》对张溥的文学思想进行探讨。文章以张溥所撰写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为首，论述晚明时期当时的政治与文学思潮背景。文中，钟涛有对张溥的文学复兴运动进行了详细的说明。然后，文章也有对张溥的文学思想概念如“文以情生”进行了深入的论述，让人们能够对张溥的文学创作与其思想有更深入的认识与理解。（钟涛，1994：76-82）

对于张溥的文学思想，李江峰于2006年也在期刊写了一篇文名：从《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看张溥的文学思想。李江峰认为张溥的文学思想的核心是“复兴古学，务为由用”，并说明了张溥复古文学思想的几个鲜明特征。文章也对张溥的部分题辞进行说明解释，可说是对张溥所撰写的题辞拥有深入的了解。（李江峰，2006：4-8）

然后来到博士论文有陆研军对张溥的研究。此论文虽然专注在于张溥的人生研究为主，但其也有对张溥的思想进行探索，如张溥的学术思想与文学思想等。另

外，文中也在张溥散文研究部份有对题辞进行论述，资料尚算丰富。（陆岩军，2008：1-176）

最后，《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中的人物批评》硕士论文中，柯昌礼有研究关于张溥次文集。此研究方向是对张溥的文集写作结构与人物批评倾向为主。当中也有讨论此文集中的人物批评方法：比较批评、知音批评、和虚拟语境批评。再来则是研究该文集语言的新美学，即对题辞语言的新美学及题辞人物批评的美学意义。（柯昌礼，2006：1-44）

因此，可看出学术界对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及其题辞的关注是较少的，目前来看更多的是将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视为史料依据进行引述参考，而对题辞本身的文学特色尚无完整的研究结果。

第三节 研究方法

首先笔者此论文以张溥所撰写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中《潘太常集》与《潘黄门集》里的文章及评价作为首要参考资料，进行文本解读与分析。接着，对张溥其背景作出大略的论述后，本文通过陈书录的《明代诗文的演变》及王运熙与顾易生所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为此章节的主要参考书，探讨张溥文学复兴运动的过程及其思想理念。再来便讨论其推崇复古运动的要点，对其文学复古思想进行深入的论述。其中对张溥撰写此《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的原因进行论述。在下一节本论文将以“二潘”为切入点，论张溥选择潘岳与潘尼入该文集的原

因。

完成张溥的部分后，便进入第三章，即从张溥的视角看潘岳与潘尼的比较。首先会先解释张溥为何在品行差异上选择潘岳与陆机作对比而不是潘尼，还有对两位文人作品与个性上的特性进行论述。然后，笔者也从张溥的视角对潘岳与潘尼在生活际遇上的不同来做比较，从中探讨张溥眼中的“二潘”之差异。为了能更了解“二潘”的生平及他们文学创作上的资料，本文以徐公持所编的《魏晋文学史》及《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二书为补助。

接着，笔者将会探讨张溥对“二潘”文学作品所作出的评价进行论述，即潘岳的哀诔文及潘尼在人品上的叙述文章。此章节笔者除了以《魏晋文学史》作为参考资料，其中也会以刘勰的《文心雕龙》此书作补助文献，以便能够有效地对“二潘”的文学作评进行评价与赏析。另外，笔者也以部份主要研究潘岳与潘尼的学位论文做补助资料，以便更迅速了解“二潘”其人与其文。

因此，此论文将分成几个部分进行讨论：第一章为绪论或对整篇论文的概括；第二章则是从张溥所撰写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看其文学复古思想及择“二潘”入该文集的理由；第三章主要讨论从张溥的视角探讨潘岳与潘尼在性格及文学上的落差；第四章乃是探究张溥对“二潘”在文学成就上的评价及对他们的文学作品作出赏析及论述。最后，再对整篇论文作出总结。

第二章 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看其文学思想

张溥（1602-1641），字天如，号西铭，明代南直隶太仓州人（今江苏太仓人），崇祯四年（1631）进士，后来于40岁病逝，堪称英年早逝。张溥是晚明时期一位影响力极深的人物，既活跃于社会活动，也是一名文人。天启末年，张溥与张采等成立了应社，而应社之创立是为了尊经复古。崇祯二年，张溥与同道人士结成复社，此社乃是明末时期极有一定影响力的社团之一。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反映了张溥的复古思想。全书118卷，包含了汉魏六朝至隋朝103位作家作品的别集，其中汉20家，魏12家，晋22家，南朝38家，北朝6家，隋5家，合103家。《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一书保存了汉魏六朝百三家的作品，且张溥在编此文集后，更为书里头103位文人作品作题辞。这些题辞评人评文，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对百三家其人其文，都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家家有题辞，人人有论述，分之则为作家各论，合之则为文学简史”，（李江峰，2006：4）不仅对研究汉魏六朝文学提供了补助资料，且在探析张溥的文学观念也有极大的帮助。另外，殷孟伦于1935年为《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作注，引入了实证史料，对百篇题辞作出详细的注解。张溥在撰写此文集着重在“评”；而殷孟伦则重于“证”，这样以文献来替文学进行辅助的概念，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

第一节 张溥的文学复兴运动

张溥在明代的文学作用有两点，其一，从复古的角度来看，前人的复古兴潮都围绕在“诗必盛唐，文必秦汉”，再来就是唐宋八大家等，而对于汉魏六朝文学都处在被人遗忘与忽略的状态。明初，开国文臣之首宋濂力主宗经，以明道致用为文章的主旨，具体的途径为宗经和师古，其表现则为辞达而道明。他在《徐教授文集序》说道：“天地既分，道在圣贤，圣贤之役，道在六经”；又在《六经论》云：“六经皆心经也... ..六经之所以毕吾心之理也。”，可看出六经在宋濂心目中的地位是文学、理道、事功的最高典范，并且是一切文史的本源。（王运熙、顾易生，2007：36）这种崇儒宗经、文道合一的思想并非是宋濂所独创，从刘勰到韩愈、周敦至朱熹，一脉相承，源远流长。（陈书录，1996：63）然而，这文学思想在明初得到了当时朝野上下的赞同与支持，说明了宋濂在明初朱元璋时期的影响力与特殊地位。

接着明代中期，面对着正宗文坛上儒雅品味日益下滑的趋势，李东阳“如衰周弱鲁，力不足以御强横”，而台阁重臣杨一清则勤力于儒雅文学的复壮，显示出茶陵派向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过渡的征兆。（陈书录，1996：152）前七子所主张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倡导学师前人，在当时其也被人们视之为复古派。另一边追求自由与狂放的杨维桢，即吴中派也拜倒在唐人的脚下，然吴中派抒发出其独特的审美价值，成为晚明袁宏道等人的过渡桥梁，不容忽视。

到了明代后期，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相继而起，他们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思潮，即只要求人们摹拟秦汉时期的文章，于是决定不再徘徊于前人的创作成就

中，扩大了作家的视野，强调作家自己情感的抒发，为明代的诗风注入新特色。

（李江峰，2006：5）然而到了晚明时期，这时期明朝代可说是处在崩溃、血火交战的年代，全民上下都不时忧国哀伤。在这种情况下，复古兴潮的声浪又再次奏响。他们希望能够复兴古学以对抗朝政腐败，激发汉民族意识与精神，挽救明代。

这时候出现了张溥所创立的应社、复社，再次提倡复古运动。另外，也有以陈子龙为代表的师古复雅的思潮与以张岱为代表的师心尚俗的思潮（陈书录，1996：457），在这转化中形成了一股新美学风貌。刚刚说到了张溥在明代文学的作用，其一除了复兴前人所未有倡导的汉魏六朝文学，其二乃是因为张溥其身世乃处在晚明时期，而恰好那个时代人们都特别强调革新运动，张溥对此表示感到不满意。虽然明代以前文学革新运动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但是他们只是着重在古人创作中字句摹拟的层面，缺乏作家的真实抒发情感，使作品却少了应有的生气。而张溥所提倡的复古是要以古文来学古人、行古道。（钟涛，1994：78），反对公安派、竟陵派诗风逐渐趋向俚俗，希望以汉魏文风来挽救这种局面。再者，张溥反对贵古贱今，他虽提倡复古，但不贱今，与那些盲目追求复古者是具有区别性的。他强调在文学上不能一味地摹古，也不能为世俗所左右，失去雅正的审美追求：“居今之世，违时抗往，则声华不立，投俗取妍，则尔雅中绝。”（钟涛，1994：78）因此，张溥也选择了复兴汉魏六朝此复古文学运动。

提到张溥的复古文学思想，在其《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序中便能体现出他的文学史观，序中说道：

“两京风雅，光并日月，一字获留，寿且亿万。魏虽改元，承流未远；晋尚清微，宋矜新巧，南齐雅丽擅长，萧梁英华迈俗。”（张溥，1961：314）

首先，张溥认为“两京”的文学可以与“日月”相提并论，而这里的“两京”是指现今的东汉与西汉。对此，张溥对两汉的文学成就作出了极高的评价。接着，对于魏朝，张溥给予“承流未远”之评语。这是因为魏朝虽然改朝换代，但是其文学依然继承了“两京”的文学精髓，而得以继续流传。由此可见，“张溥对两汉文风颇为推崇，在对友人的评价中可略窥一斑，《近集·古照堂序》云：‘令修笃行，酷类若翁，其文风格在东西京间。’”（陆岩君，2008：102）显然，张溥崇尚东西汉的古文词等文章。

接着，在晋代时期，张溥指出人们偏好清谈的风气，而此风气随之也渲染了文学作品中，于是对于晋给予“清微”的评说。随后张溥认为宋代的文章“心巧”、南齐的文学作品则“雅丽擅长”，而对于萧梁时期的文章张溥给予“英华迈俗”之评。宋、齐、梁三代，是古代文学声律渐备的时期，沈约等人的“四声八病”说逐渐形成，文学渐重词藻和声律是这一段时期的特色。（李江峰，2006：6）由此，各时期的文学作品在发展演变过程中都体现出各自时代的独特之处。张溥最后说道：

“总言其概，椎轮大路，不废雕几，月露风云，无伤骨气，江左名流，得与汉朝大手同立天地者，未有不先质后文、吐花含实者也。”（张溥，1961：314）

张溥认为六朝文学在风格上虽各大不同，但它们的文章“先质后问，吐花含

实”，与东西汉文章可并肩对比。张溥对于文过其质的写作方式表示不认同，他认为一篇好的文章除了着重在其“文”，其“质”也应该得到相同的重视，两者相符。他追求的是一种即有质又有文的文学，然而在质与文对比起来他更看重的是质。显然地，张溥强调文学作品的内在，即应该有救世的作用，而不是只顾其外。再者，他也主张辞文必须是作家所真情流露的坦诚言辞，文字应真诚朴实，不强词夸张。这也是张溥复古文学思想与明初崇儒复雅简单地重复思潮不同，也与明中前后七子盲目地复古有相异之处，而张溥所主张的复古思维是在继承古人思想精髓的同时，又强调应有自身独特的新想法与变化。可见，张溥给予汉魏六朝百三家作品的评价是较高的。

张溥的复古思想非常强调于作家的道德品行操守行为，对于贪图金钱权力、功名心重者表示了极大地不满。因此在题辞中，张溥通过评价众文人而确立了其心中理想的人格。他认为含有优越人格的人物首先应该符合儒家伦理道德标准，遵从君臣之纲，重节受义，有君子风范；其二就是能致力于儒家经史，承担起传承儒学的历史责任，再来是具备较高的文学艺术修养和突出的政治才能。（柯昌礼，2006：20）由此可看出，比起才华或才能，张溥更看重于他人的德性。

张溥在构建这种其心目中的理想人格也并非偶然。明史里有记载张溥年幼时刻苦耐劳好学，凡是他说阅读过的书他都会在阅毕后手抄数遍，甚至把手掌给弄伤。张溥在创立应社时提倡“尊经复古”，因此对于儒家经史他更是产生了至大的兴趣。《明季南应社考》云：“应社之初起，颇以读书为事... ..然张溥、张采等人皆有经注。”（蒋逸雪，1982：11）除此之外，《春秋三书》三十三卷，《十三

经诂释》等著作都能见其遗著当中，（柯昌礼，2006：21）可见张溥极重视儒家经史的经典价值，因此在评价人物时以儒家思想来评断人物的人格品行概括。且当时明末时期社会动荡，大家都以保卫家国求安身立命之道为目标，成为那时候的一股潮流。由此张溥所倡导的复古运动也是这股兴潮的其中之一。

身处在政治与社会不平稳的明朝末期，张溥以文学创作的方式来抒发其个人的政治抱负，激励文人讲究品格，重视道德品行。他希望人们能拥有着一颗济世的心挽救处在水生火热的民生。其复古的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第二节 张溥择“二潘”为《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之因素

在张溥撰写《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时，较早前便已有张燮所编的《七十二家集·题辞》一部关于汉魏六朝诗文总编。张燮所编的《七十二家集·题辞》是明朝代在整理汉魏六朝文学的重要成果，此文集突显出张燮深刻的文学关于道德观，文集里不仅有对汉魏六朝文学的批评，当中也涵盖了对作家的生平事迹，品行操守问题，及其所处时代的社会背景与历史环境等情况也都涵括在内。（王史心，2004：1）因此，可说张溥所编撰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很大程度上深受张燮所影响无误。根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提要云：

“自冯惟讷辑《诗纪》，而汉魏六朝之诗汇于一编；自梅鼎祚辑《文纪》，而汉魏六朝之文汇于一编；自张燮辑《七十二家集》，而汉魏六朝之遗集汇于一编。溥以张氏书为根柢，而取冯氏、梅氏书中其人著作稍多者，排比而附益之以成

是集。”（永瑛、纪昀等，1965：1724）

张溥有感于因不满前期三十余家或派别，于是编这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及撰写全部题辞，反映出他的复古文学运动的思想。另一方面，他也想复兴汉魏六

朝美学的风貌。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里张溥收录了多家西晋文人，而本文则是从张溥的角度去看潘岳与潘尼二人。此举能看出张溥眼里的“二潘”，而不是简单的“二潘”，更多的是去探析张溥的思想。总所周知，潘岳与潘尼在西晋时期乃是著名的文学家，因此张溥之所以会选“二潘”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里并不是因为张溥特别喜欢二人，而因他们在西晋的影响力足以让他们成为此文集里头的一部分。

在历史上，潘岳被定为为“性燥，趋世利”之人。从此以后，人们对潘岳的评价有好有坏，当中不乏存有一些负面形象。从文学成就的角度来看，潘岳是一位才子，其作品大致受到大家的好评，对其文学成就给予了很大的肯定。如其诗词歌赋样样精通，在文学上更是享有“情深之子”的美名。另外，他擅长书写哀悼文或哀诔文。然而，从历史的角度去探潘岳的形象确完全相反。后世对于其人格操守问题都不敢恭维。

在张溥的文学评价当中，有这么一个点在先，人品在先，文学其后。这样的一种处理方式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张溥的用意确实是为了希望能做到让后世学习的一

个典范或榜样。历史上我们都知道潘岳因当时政治背景而选择了一道不归路，从此其人生与形象就出现了巨大的变化。此也说明潘岳或许因要在这乱世中保其命而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误入歧途。其实，潘岳的人品比起一些历史上的暴君贪官还算不差的，只不过在这种文学评价上，潘岳是注定要倒霉的，只能说张溥对潘岳在人品上的评价或要求有一点过于苛刻。而且，张溥对潘岳的评价始终也没有跳脱出传统的看法。因此，像潘岳这种其人其文拥有争议性的也毫不犹豫地入选张溥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里。这也正好符合了张溥在撰写题辞中其人物批评倾向。

至于潘尼在文学成就上自然不能与潘岳相提并论，其表现不上不下，但是在西晋时期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成为西晋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与潘岳并称“二潘”。潘尼的文学作品有他自身的特色，当中以赠答时居多，从诗中内容能看出他对亲朋好友深厚的感情，除了对他们表扬赞颂，更多的是表现出对朋友的相劝与关怀。虽然潘尼与潘岳同处乱世时代，但是并没有步入潘岳的步伐，表现出出淤泥而不染的态度。如在西晋太康时期，潘尼是少数文人与“二十四友”拥有密切来往的关系。其性格较收敛而专注于研习儒家经典，对于儒家文化有深层的了解。因此，作品也不乏拥有感概时事与安身为内容的文章。

对于潘尼这样充满正面形象的人物，也正好符合了张溥在题辞中的理想人格。张溥重视富有君子风范、具有较好道德品行的人物，且首先看重的是应达到儒家伦理道德之标准。确立这样的理想人格与张溥当时所处的政治背景及其人生经历有这息息相关的关系。因此对于潘尼这般优秀之文人更是受张溥所推崇，毫无悬念地选之入其文集里。

第三章 从张溥的视角看潘岳与潘尼之比较

潘岳（公元 247-300）字安仁，是西晋时期一名文学家，祖籍荜阳中牟（今郑州与开封之间），后徙居巩县。他曾任河阳令、著作郎、给事黄门侍郎，人称潘黄门。因潘岳拥有娇美容貌，有时候人们也称他为潘郎。他与侄子潘尼同以文章知名，文学史上称为“两潘”。另外，他与陆机也是太康文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并称为“潘陆”。潘岳卒年五十四，实亦人未尽才。

潘尼，字正叔，生于曹魏正始（241-249）后期，少有文才，与叔父潘岳以文学齐名。太康中举秀才，历任著作郎、秘书监、太常令。他的诗作注重词藻，多应酬赠答之作，原有集，已散佚。永嘉五年，在兵荒马乱中病卒于坞壁，年六十余。

在大略了解潘岳与潘尼的生平后，此章节将以《潘太常集·题辞》及《潘黄门集·题辞》为首，从张溥的视角去对潘岳及潘尼在性格、文学成就、及生活际遇上做出对比。

第一节 张溥论潘岳与陆机的品行差异

张溥在进行人物批评时非常注重一个人的品行德性，当论及某个文人的生平与作品时往往会先将人物的“德”摆在最前，然后才来谈他们的文学成就。潘岳来自

于西晋时代，在文学史上虽有“二潘”之说，但是潘尼在文学的分量却不能直接与潘岳相提并论，俩人的水平还是有一定的落差。反之，能与潘岳在文学上较量的是陆机与左思，其中与陆机最广为人知，被称为“潘陆”，乃太康文学时期的重要人物。钟嵘曾在《诗品》里说道：“陆才如海，潘才如江”，对于这一点张溥也表示赞同：“籍田赋客舍议业并以典则见称，陆海潘江，无不善也”。（张溥，1961：124）众所周知，潘尼的文学成就不比潘岳来得好，品行也不见得有任何不足的地方，因此为了更突显出一个鲜明的对比，张溥唯有拿在文学成就上与潘岳不相上下的陆机进行比较，证明是否一个在文学成就表现优秀的人，其品行一定会有问题。而这种“潘陆”选择作法早在南朝《文心雕龙》时代就已存在，所以张溥拿陆机与潘岳进行对比也是一种常态的做法，是无可避免的事。

张溥认为：“陆海潘江，无不善也，独惜其愍怀诈书，呈身牝后，屈长卿之典册，行江充之告变，重污泥目自辱耳”（张溥，1961：124），他欣赏潘岳的文学作品，但同时又特别强调人物的道德品行之有无。张溥又说：“二陆屠门，戎毒相类，天下哀之，遂腾讨檄。安仁东市，独无怜者，士之贤愚，至死益见，余深为彼美惜焉。”（张溥，1961：124）从这里可看出他所采取的方式是将潘岳与二陆之死作比较。根据前人所作出的研究，陆机与陆云之死与那时候政治的混乱及社会动荡有密切的关系，对于“二陆”的离去，天下人都为他们感到哀伤，同时张溥也对此深感同情。

相反地，潘岳在刑场上被处死时却没有获得人们的可怜与惋惜，所以张溥也感慨的发出“士之贤愚，至死益见”（张溥，1951：124）之评。在张溥看来，文学

成就并不足以成为取舍人物的标准，他认为人们应该抛弃欲望，要有大胸怀，这样的道德品行张溥是特别推崇的。对于潘岳的人格问题，张溥还举潘岳的具体诗作来说明，文曰：

“闲居一赋，板舆轻轩，浮杯高歌，天伦乐事，足起爱慕。孰知其仕宦情重，方思热客。慈母拳拳，非所念也。杨骏被诸，纲纪当坐安仁，赖河阳旧客，得脱躯命，而好进不休，举家弥灭害。”（张溥，1961：124）

张溥认为其《闲居赋》藏有潘岳为了追求功名，对于入仕任官的情节很重，其描写所思慕的客人、母亲的样貌可说都不是他所注重的。潘岳的热衷仕宦，的确是有所根据的，如《晋书》所载的：“岳性轻躁，趋世利”。对于潘岳的遭遇，张溥深感惋惜，他意识到潘岳热衷功名利禄、望尘而拜、巴结权贵，但是潘岳这样的人品只不过是当时政治局势所逼迫，或许潘岳不这样做其后果将会更不堪设想，因此也有了“深为彼美惜焉”之评。这也表示，对于潘岳在历史上的负面形象，张溥虽然有其独到的眼光，但始终没有逃脱出前人对潘岳评价的基础上。

第二节 张溥论潘岳与潘尼的生活际遇对比

张溥十分重视其笔下人物的生平遭遇，叙其生平与事功，是题辞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张溥在叙述笔下人物的生平事功时，显然是站在“以德论人”的立场，对人物进行了鲜明的取舍。对于他所崇尚的人物，张溥通过比较表示了深深的同情。潘尼性格作风与潘岳大有不同，对于他们的命运遭遇，张溥进行了对比，《潘

《太常集题辞》载：

“元康荐乱，八王斗争，从父安仁，一门稚祸，正叔知几，归扫坟墓，后得封公职，寿终塙壁……存没异路，荣辱天壤，逃死须臾之间，垂声三王之际，至今诵闲居者，笑黄门之干没，读安身者，重太常之居正，人物短长，亦悬祸福。”

（张溥，1961：130）

张溥认为人们的长短之处，与他们的祸福是息息相关的。潘岳为人反复，热衷功名；潘尼则为人遵循正道。张溥对于叔侄二人的褒贬取舍是明显的。而“存没异路，荣辱天壤，逃死须臾之间”，认为生存与死亡是两条不同的路，荣誉与侮辱是天壤之别，逃避死亡只是在须臾之间，这也寄托了张溥对于人物命运无常的一种感慨。说到两人的关系，潘岳潘尼“义惟诸父，好同朋友，而且俱以文章见之”（姜剑云，2002:46），两人年龄相差不大，自小就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张溥云：

“当安仁初任河阳，赠诗祖道，美其天姿。刑僇之后，树碑纪事，增恻覆醢。其于叔父情笃，犹中郎也。”（张溥，1961：130）

从此段文可看出两人虽身在不同的地方担任吏职，潘岳初被派到河阳任官时，潘尼却不忘为他作诗送行，赞美他的风姿，且还不避嫌地在他遭遇杀害之后为其作树碑记事，张溥对于潘尼此举动表示赞赏有加，认为这就好像蔡邕写的碑文一样，十分令人之动容。

学者姜剑云认为在太康群才中，个人的交游态度与方式并不完全一样，大致可

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属于交游较广的，对象之身份地位也较高；第二种则是交游不多，较少攀结权贵的，而潘尼正是属于第二种的。从潘尼现存的赠答诗数量看来，较张华、潘岳、二陆等人，其交游的数量无疑要偏少，但还是要比傅玄、左思等人要多。潘尼至今现存的赠答诗有：《献长安君安仁诗》（十章）、《赠司空掾安仁诗》（十章）、《赠河阳诗》、《赠陆机出为吴王郎中令诗》（六章）、《答陆士衡诗》、《答傅咸诗》（并序）、《赠侍御史王元贶诗》、《赠长安令刘正伯诗》、《赠陇西太守张仲治诗》、《赠荥阳太守吴子仲诗》、《答扬士安诗》、《送卢弋阳景宣诗》、《送大将军掾卢晏诗》、《赠汲郡太守李茂彦诗》、《赠刘佐诗》、《赠二李郎诗序》，计十六首之多。（姜剑云，2002:45）由此可见潘尼之交游众辈，既有才德兼具的当下名世也不乏有名不见经传的下层人士，交际范围甚广。

从潘尼的交游之辈来看，可看出他持有良好的态度，人们到处交友不乏贪图利益或为了势利而结党。潘尼重视朋友之间的情感，对于交游的态度抱有自己的作风。其一，始终持有谨慎择友的态度，不做贪于功名伶俐之徒。晋初政治稳定、君臣主仆之间朝会游宴频繁，文士百官应诏赋诗，各展奇才，而潘尼的作品也少不了有对权主的颂和之音，然而其内容都是以宴饮的情景为题材，如《七月七日侍皇太子宴玄圃》、《上巳日帝会天渊池诗》、《皇太子集应令》、《皇太子社》等。这些诗歌多是描写宴饮当时的美景，及表达了诗人愉快的心情。另外，潘尼善于处世之道及交游原则的他，并没有仿效潘岳的行为，即为了功名伶俐而投向拥有强大势力的人物，如贾谧。潘岳乃“二十四友”之首，而潘尼则选择不参与其中，可见

其交友之慎重。

反之，潘岳最大的过错就是择友不当，他是曾努力过想表现突出自己，但他因过于轻躁，露才扬己，锋芒必现，往往欲速而不达，缺少际遇。（徐公持，1999：333）他选择巴结贪权富贵的贾谧作为靠山，贾谧在当时拥有庞大的政治势力，这也形成朝政上上下下小人物争往巴结的对象。历史上有不少政客文人因交游不慎而连累了自身家族，后果不堪设想。而潘岳也和其他人一样，如石崇，为了讨好贾谧的欢心，每次看见贾谧的车经过，便对着车子叩拜行礼，显示出一份忠心的样子。潘岳喜好名利，虽其母亲有加以相劝，然而潘岳把母亲的话当耳边风，依然我行我素，直到出了状况才后悔来不及，导致其全家遭遇祸害。

其二，潘尼看待朋友诚恳，着重感情与才情。他现存的诗歌大部分是好友之间的赠答诗，从中可看出其重视知心知交。潘尼与潘岳虽是叔侄关系，但他俩的交情却有如亲密的挚友，从他们的赠答往复篇章便能看到内容都充满了深厚的亲情。如《赠司空掾安仁诗》云“骋辞泉涌，敷藻云浮”，“终贾杜口，扬班韬翰”，在《赠河阳诗》云“流声馥秋兰，璃藻艳春华”，对潘岳的才华赞美称颂外，又有对其的关心与思念之情。另外，潘尼与其他人的赠答诗，如《送大将军掾卢晏诗》、《赠汲郡太守李茂彦诗》等，也可看出其真情实感流露的一面。他在《答傅咸诗》深怕傅咸的直性子惹来杀生之祸，于是作诗作规劝，表达出对朋友的信赖与关心，张溥对此赞叹潘尼说道：“傅长虞会定九品，正叔作诗规之，其为人也，无谗随，其为文也，无戏谑大致类然。”（张溥，1961：130）而他欣赏陆机“玩尔清藻，味尔芳风”的人格精神，赠答诗有《赠陆机出为吴王郎中令诗》与《答陆士衡诗》

两篇，表现出与陆机深厚的友谊。（缪定中，2007：9-11）

相反地，潘岳虽然也有几副赠答诗，然其对待朋友的心却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潘岳对待朋友的态度是因为他选择了一个价值观不良的环境，导致他的人格也受到影响。或许，潘岳其实自己本身可以不去选择那个环境，及如果他有听劝与母亲的好言相权，其也有改过自新的可能。然而，因为名利蒙蔽了其双眼，导致潘岳最终没能克制他的邪念，连累了其一家人。

最后，潘岳的岳父杨肇生平最大的挫折是败于东吴名将陆抗，也就是陆机的父亲，因此潘岳一直视陆机为冤家，虽然他们俩都是“二十四友”成员，潘岳还是会寻找机会讥讽陆机一番，陆机也不甘示弱地反击对方，这放映出上一代所造就的恩怨之深。然而令人欣慰的是潘尼不会因为叔父与陆机的关系而影响到他与陆机之间的友情，即便是他所交之友如潘岳、陆机等人的品行道德不完美，他却能做到出淤泥而不染，真正做到了其所言的安身存正。

总结张溥对二潘的比较，其着重点是有不同的趋向，他在论及潘岳文学成就很高的同时，也不意味地就只是着重在他的文学成就，他还是有看到潘岳的不足之处。但是这种坚持，一方面给予潘岳在文学方面很高评价的同时，又要同时说出他的道德品行的问题，这种其实始终没有跳脱出传统对潘岳的一种偏见，而实际上潘岳在历史上并没有害及任何人。至于潘尼则是较符合张溥的要求，其一生平稳，没有大功也没有大过，而就是这些界定了潘岳其人及诗歌的批评所带来不利，故张溥对他的人格有恶之评。因此，张溥对潘岳的评价有新鲜、新颖特出，展现出张溥个人思想的一面，但也有他不可跳脱出来的地方，还是受到前人的影响。

第四章 张溥对潘岳与潘尼的文学作品评价

潘岳在西晋堪称为才子，写作技巧都在许多文人之上。他擅长诗词歌赋，所作的篇文流传于世，成就不小。《昭明文选》对于潘岳的文学成就给出了极高的评价，里头收录了潘岳 23 首诗文赋，并在其文方面，有 5 篇是关于哀诔文，分别有《马汧督诔》、《杨荆州诔》、《哀永逝文》、《杨仲武诔》与《夏侯常侍诔》。另外，张溥《潘黄门集题辞》收录共计二十三篇，其中哀文九篇，分别是：《景献皇后哀策文》、《哀永逝文》、《为杨长文作弟仲武哀祝文》、《京陵女公子王氏哀辞》、《阳城刘氏妹哀辞》、《金鹿哀辞》、《伤弱子辞》、《悲邢生辞》，与《为任子咸妻作孤女泽兰哀辞》。祭文则是由三篇，分别是：《吊孟尝君文》、《哭弟文》及《为诸妇祭庾新妇文》。而诔文共涵盖十一篇，分别是：《世祖武皇帝诔》、《太宰鲁武公诔》、《杨荆州诔》、《杨仲武诔》、《马汧督诔》、《庾尚书诔》、《夏侯常侍诔》、《南阳长公主诔》、《皇女诔》、《贾充诔》和《宣城宣君诔》。（高胜利，2012：167），可见潘岳的哀诔文学创作有其独特的功力，成为世人学习的榜样。同时，刘勰在其《文心雕龙》书卷都有提及潘岳之擅长哀诔文或哀悼文章，如《诛碑》、《哀吊》、《指瑕》、《祝盟》等，都对其才华

表示赞叹。

与潘岳有叔侄关系的潘尼在性格作风上却与潘岳大有不同，其文学成就与潘岳对比起也有一定的差距，但这不影响潘尼在西晋时期仍是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他的作品还是有其独特之处。潘尼从小在与他人相处时都会抱着“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态度来待人，且其勤奋好学，为人正义。因此它的文章也多讲究安身、保身与雅正。然而，潘尼留世的著作或作品不是很多，其作品现今共存有 56 篇，“其中诗 30 首，赋 15 篇，（四篇有缺文），其他箴、颂、论、序、铭、碑、碣类 11 篇（有四篇仅余残句）。”（孟晗，2013：66）这些作品都体现出雅正雍容的特色，展现潘尼儒家文人及其高尚人格的一面。另外，由魏征等人编写的《晋书·潘尼传》中载潘尼文章有三，第一篇是《安身论》，内容说明潘尼安身立命所守之道以及其静退的性格；第二篇是《释奠颂》，关于皇储宫之毓德；第三篇则是《乘舆箴》，内容有关帝王之保治才。（转引自贾静静，2008：21）后两篇大致内容都是突出潘尼对君王的期盼及理想社会的向往。这三篇文章可说是潘尼现存作品中具有代表性之作。

因此，本章节将会以张溥在《潘太常集》及《潘黄门集》对俩人所作出的评价为首，并对潘岳的哀诔文及潘尼在人品或人格上的叙述作品作出论述。

第一节 潘岳的哀诔之文

哀诔文是指古时候人们为了哀祭死者所写的哀悼文章。诔文在最初的时候有

为死者定“谥”的功用。所谓“谥”是指谥号，即古代统治阶级成员死后，将由朝廷评定其一生的德行功过。（褚斌杰，2005：441）“潘岳是西晋著名文学作家之一，与陆机齐名，擅长诗赋，其一生中作过不少哀诔文。其所哀悼的对象有皇亲国戚、亲人朋友及妻子弟妹，如《太宰鲁武公诔》、《杨荆州诔》等。对于潘岳的哀诔文或哀悼文章，刘勰给予了极大的评价，如：

“潘岳构意，专师孝山，巧于序悲，易入新切，所以隔代相望，能徽厥声者也。”（刘勰，1999：436）

“虑瞻辞变，情洞苦悲，叙事如传。结言摹诗，促节四言，鲜有缓句。故义而文婉，体旧而趣新。”（刘勰，1999：471）

从上述《诔碑》与《哀吊》字句来看，刘勰在其《文心雕龙》肯定了潘岳哀文的创作成就，说明他除了在结句的声情、辞情和语言构造两方面生动准确地表现了哀伤的情致特征，使得作品“义直而文婉，体旧而趣新”之外，关键还在于“情洞苦悲”和“虑瞻”。（张国星，1984：34）这些主要体现于潘岳在描写哀文时，擅于运用自身所体验过的哀伤经历去体会人们的悲伤情感，甚至也把自己的情感注入内里，其这样的做法巧妙地把哀文里的悲痛之情感给涌上心头。例，潘岳为其胞妹所作的《阳城刘氏妹哀辞》，里头一句“鸟鸣于柏，乌号于荆；徘徊踟躕，立闻其声……叩心长叫，痛我同生”（徐公持，1999：342），展现了潘岳对死者沉痛的哀号之声。其以鸟号来引出失去妹妹的痛苦，更是渲染了凄凉的气氛。

同样地，《晋书》卷五十五《潘岳传》载：“岳美姿仪，辞藻绝丽，尤善为哀

诔之文。”（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等，1996：1507）他对于作品中人物的刻画手法细致及善于渲染气氛，且所散发出的情感有到位，让读者也情不自禁地陷入他悲哀的文彩里。由此可见，潘岳的哀诔文奠定了他在西晋文学史上的地位。

潘岳的哀诔文巧于借外景抒发自己的情感。如在元康八年秋天，潘岳的妻子逝世让他难过不已，于是写了《哀永逝文》来悼念亡妻。在文中，潘岳精明地运用了大自然景物如天地山河、花草树木、飞禽等来衬托出他的哀情，表现手法自然朴实。如“风泠泠兮入帷，云霏霏兮承盖。鸟俛翼兮忘林，鱼仰沫兮失濑。”，突显出哀境中浓郁的悲伤之情。他对于哀情与哀境之间的关系拥有深刻的理解，认为四节运行、山川换颜这些自然景象是与人世间的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高胜利，2012：174）再者，在描述送亡妻的时刻，潘岳把他当时的感受与外景紧紧相扣，达到一种情景交融的境界。文中说道：

兮同途兮今异世，忆旧欢兮增新悲。谓原隰兮无畔，谓川流兮无岸；望山兮寥廓，临水兮浩汗；视天日兮苍茫，面邑里兮萧散。匪外物兮或改，固欢哀兮情换。（徐公持，1999：344）

该段文写作者因为心里感到无比悲痛，所以顿时也觉得四周围都变得空旷萧条了，自然景物也不再光鲜亮丽了。这种以主观“情换”导致外物于感觉上的改变，非当事者莫能道出！此涉及审美特殊规律，其意蕴颇为深邃。（徐公持编，1999：333）。潘岳这种借助自然景物的描写来渲染凄凉的气氛，更是反映出他内心寂寞空虚冷的情感。

《哀永逝文》艺术成就极高，张溥更是将其与潘岳的《悼亡诗》及《悼亡赋》为哀诔文代表之作，说道：

“及悼亡诗赋，哀永世文，则又伤其闺房辛苦，有古落叶哀蝉之叹。史云‘善为哀诔’，诚然哉！”（张溥，1961：124）

由此，对于潘岳在哀诔文的成就张溥毫不吝啬地赞赏他，认为他的哀诔文及悼亡诗赋有闺房辛酸悲苦的哀伤，又有落叶哀蝉曲般的叹息。再来，观其《悼亡诗》，乃是潘岳最有代表性的哀情之作。此诗含三首，表达其对亡妻的怀念，笔法自然细腻，流露出作者对于人生命运不能掌握在其中而感到无比无奈。如诗中其一载：“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徐公持，1999：339），描写作者的妻子逝世后所感到的孤独感。潘岳运用翰林鸟与比目鱼来比喻他当时的悲痛，使诗歌沉寂在一阵忧伤的气氛中。可见作者虽然失去了妻子，但是其地位依然在他心中稳如泰山，妻子的死去不仅让他神思错乱、心态恍惚，而且有如比翼鸟与比目鱼被迫分开一样难以忍受，对她的思念似乎永抹不去。

再来观《悼亡诗》第三首“凄凄朝露凝，烈烈夕风厉”与“落叶委埏侧，枯蓼带坟隅”字句，虽然诗人只是描写了烈风的情景与枯叶零零飘落的情况，但是却能让人深刻地感受到相爱之人生死离别的悲哀之情与绵绵不绝所散发出来的凄凉景象。这种以描写自然景色来衬托出主人公的悲哀情感显示出潘岳哀诔文创作高超的一面。

另外，潘岳所哀悼的对象不仅是皇亲国戚亲朋好友等，也有一些诔文是为了哀悼古今名臣义士而作，其中一篇就是《马汧督诔》。张溥在《潘黄门集题辞》首句

便赞潘岳：

“予读安仁《马汧督诔》，恻然思古义士，犹班孟坚之传苏子卿也。”（张溥，1961：124）

这篇诔文是为了表现潘岳对马敦在汧城所付出的贡献与牺牲而作。潘岳与马敦在现实上素不相识，也没有任何利益上的关系，但是潘岳却为了替马敦喊冤而写了这篇哀诔文。此文反映了战乱中百姓所遭受的痛苦，叙事不夸张，富有情感化的特征，显示出了潘岳的正义感及其真挚情感的一面。

该文作于元康七年秋九月十五日，主人公是汧督马敦，因当时氏族起兵发动攻打雍州诸县，紧急关头下马敦奋勇而起率领军民守城，最终保住了城池而马敦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战后他遭到雍州从事的嫉恨，被有司冤枉，含愤而死。这篇诔文“一反潘岳一贯的凄婉风格，笔力刚健，用明快而有力的语言刻画了一位有智有勇的义士形象”，（吕慧鹃、刘波、卢达编，1997：335）马敦之死揭露了当时西晋政府的腐败，因朝中有人嫉妒贤能，便使用卑鄙手段陷害于他们，从中获利。对于此事，潘岳也感慨万分写下了《马汧督诔》这篇汧城战事，详细地叙述马敦守城的战略及将士们悲壮的情形。

张溥所说的“犹班孟坚之传苏子卿也”是指潘岳此作品有如班固为苏武作传一样，即赞叹他善于使用典故。文曰：

“昔承丘之战，县贲父御鲁庄公，马惊败绩。贲父曰：他日未尝败绩，而今

败绩，是无勇也……汉明帝时有司马叔持者，白日于都市，手剑父雠，视死如归，

亦命史臣班固为之诔。然则忠孝义烈之流，慷慨非命而死者，缀辞之士。”（徐公持，1999：345）

文中潘岳善于用典故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他将马敦之死与县贲父的意外战败而死及司马叔将死亡视为平常之事来相提并论，赞叹他与古人拥有令人敬佩的精神，反映出潘岳对忠义之士的崇敬与同情。

综上所述，潘岳在继前人描写哀诔文的基础上拥有其自身的特色，《文心雕龙·诔碑》篇说认为诔文的特点是“傅体而颂文，荣始而哀终”（刘勰，1999：442），所谓“傅体”是说诔须贴切本人而不让其显得空泛；“颂文”则说明篇文须富有韵律，然后要记叙死者的功德，论述死者荣耀寄以哀思。而潘岳在诔文创作上不仅擅于场面描写，把自然景色注入其文学作品中，形成一道融情于景的美学风貌，而且也通于借故咏今，运用典故来对比自己所要描写的对象。对此，张溥也是继承了前人的理念，赞赏潘岳哀文的出色表现，对其诔文成就给予极大的肯定。

第二节 潘尼对人品的叙述文章

自汉武帝时期实行董仲舒所提倡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距离曹魏有百年历史之久，这也形成了那时代文人们追求儒家文化的一种思潮。由此，潘尼也不另外，自小勤奋好研学读儒家经典，而这些经典之书也对其造成很大的影响，促使他拥有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与儒家思想。潘尼这种正面的人生观也间接地表现在其文学作品当中，如其作品不仅有关于中和守身的文章，还会有一些感慨时

事为内容的篇章。潘尼处于西晋动荡的朝代，那时候不管是政治或社会局势都不稳定，这促使潘尼有感而发地在其文学作品中反映当时社会的现实与残酷，且其作品也表现出他自身的人格精神和对人品的要求，这也进而使他的作品在西晋时期有一席之地。这些著作当中包括《安申论》、《乘舆论》、《迎大驾》等。

潘尼之作品，张溥在《潘太常集》给予的评价是：

“史称潘正叔‘著论究人道之纲，裁箴悬乘舆之鉴’此二文者，非徒龙甲凤毛，亦其生平之所立也。”（张溥，1961：130）

张溥这里所说的“论”与“篇”分别是指潘尼的《安身论》与《乘舆箴》，认为这两篇文章不仅仅像龙甲凤毛一般珍贵，也是因为他一生自食其力而有所建树。同样的，对于潘尼的文学成就，钟嵘在《诗品》列为中品，评曰：“正叔绿蘩之章，虽不具美，而文采高丽，并得虫龙片甲，凤凰一毛。”（许文雨，1983：72）钟嵘这里指的“绿蘩之章”即是《迎大驾》这首诗，认为作者追求辞采高丽的文字，赞其文章有如虫龙片甲凤毛般稀贵。显然，张溥对于潘尼的文学作品之评价也是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之上，认同潘尼其作品中所强调的人品问题及对其抒怀心灵中的艰辛。

提到潘尼因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所以他心系天下，希望国家能平安稳定而百姓也可以安居乐融融。然而面对西晋那种局势潘尼内心显得忧虑，因此他唯有透过文学创作来抒发其苦闷的心理。《迎大驾》一首正是潘尼感概当时社会之动乱而感到彷徨无助，于是带着矛盾复杂的心情写下此诗。

此诗前半部写景：“南山郁岑崟，洛川迅且急。青松荫修岭，绿繁被广隰... ..”（徐公持，1999:347），乃是在洛阳西道所见的景色，透露出凄凉之意。作者笔下的青松与绿繁这两色显示出其进退两难的困境。因为在当时身处乱世的潘尼其心虽存有抱负，但是想到根本没有用武之地，而为了保住性命也只能陷入两难的境地。因此，诗人笔下所写之景虽青绿相加，却因再无其他色彩而显得异常凝重，给人一种压抑的窒息感。（贾静静，2008：25）后半部说出作者所面对的困境，“狐狸夹两辕，豺狼当路立”，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隐含着对晋惠帝时期八王之乱朝廷诸王之间的残酷斗争。这首诗学曹操《苦寒行》、曹植《赠白马王彪》等，“狐狸”、“豺狼”等皆移植而来。（徐公持，1999：348）

最后作者写道“翔凤婴笼槛，骐驎见维縶。俎豆昔尝闻，军旅素未习。且少停君驾，徐待干戈戢。”（徐公持，1999：347），即隐喻作者只不过是文人学士，不习武暗军事，唯能做的只有安安稳稳地度日以待清静生活之到来。这样的等待唯恐遥遥无期，显示了潘尼当时内心的矛盾。此诗虽然含有明哲保身的思想，但仍能隐约感受到潘尼忧时忧国的情感。

接着，《安身论》篇章被看作是潘尼的人格精神与人生价值观念。他现存的作品大致上都体现出“雅正”的特点。如潘尼讲求安身守正，其《安身论》一文富有正气，沉稳雅正。其论云：

“盖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尚乎存正，存正莫重乎无私，无私莫深乎寡欲。是以

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笃其志而后行... ..（严可均，

1958: 2003)

潘尼认为崇德是人们在人生中必须追求的目标，乃属最高境界，崇尚美德前首先必须先得修身。这里“身”的概念不是纯粹指肉体形躯，而是指人们的心智模式。因此除了“安身”，也必须要做到“存正”、“无私”和“寡欲”，且“不妄动”、“不徒语”、“不苟求”与“不虚行”也是人生行为上的另一种要求。潘尼会提出这些概念不是偶然的，因为其身处在当时战乱不断的年代里，西晋社会的恶略行为如自私、贪欲等导致许多人在频频发生的政权争夺中丧命。对于这种状况，潘尼接着说道：

“夫然，用能免或击之凶，享自天之祐。…忧患之接，必生于自私，而兴于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济其欲，理之至也。欲苟不至，能无争乎？私苟不从，能无伐乎？人人自私，家家有欲，众欲并争，群私交伐。争则乱之萌也，伐则怨之府也。怨、乱既构，危害及之。得不惧乎？”（严可均，1958：2003）

他对于人们的自私行为、贪图欲望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抨击，认为自私与有欲必会带来争伐与严重的危害。唯有人们不妄动、不徒语、不苟求与不虚行；提倡存正、无私和寡欲，方可达到安身之境界。潘尼的《安身论》思想并不是为了特别建构某种君子人格，而重要的是基于对时代政治性人际生态的审视，和对于现实中无数次血的教训的总结。（姜剑云，2002：46）此外，潘尼也在《乘舆论》说道：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安可求而得，辞而已者乎！”（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1996：1514）他认为人们应该克制本身的欲望并与天下万物同利互

相协调。所以，他描写关于君子人品的同时，还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了当时社会上的不良习气：

“然弃本要末之徒，恋进忘退之士，莫不饰才锐智，抽锋擢颖。倾侧乎势利之交，驰骋乎当途之务。朝有弹冠之朋，野有结绶之友。……大者倾国丧家，次则覆身灭祀。其故何邪？岂不始于私欲，而终于争伐哉？”（严可均，1958：2003）

潘尼这样的描画显示出其年少时期的社会背景或政治风云变幻不定，因为权力争夺而爆发的战乱，如司马氏为了篡位力排异己，让许多正义之士丧命黄泉。那时期的文学之士也开始纷纷收敛起读圣贤书而产生的入世豪情，转向对个体内心世界的抒写，表达心中的看法。而潘尼的作品无疑也表现出这样的时代特点，虽然他当时处于一心刻苦研读圣贤书的时期，却也并非对国事毫不留意或关心。

另外，在《乘輿箴》，他以委婉的文字描写当今圣上应善用朝中士臣，并描述了其心目中理想的君主形象：“总万机而抚四海，简群才而审所授，孜孜于得人，汲汲于闻过，虽廷争面折，犹将祈请而求焉。”（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著 1996：1514），从中可看出潘尼积极入世，望能在仕途上有所作为。他对于这些为了一己私欲、欺善怕恶，且贪图荣华富贵之人感到不满，并一针见血指出“大者倾国丧家，次则覆身灭祀”的危险性。最后，他在《安身论》提出说道：

“治其内而不饰其外，求诸己而不假诸人。忠肃以奉上，爱敬以事亲。可以御一体，可以牧万民。可以处富贵，可以居贱贫。经盛衰而不改，则庶几乎能安身矣。”

(严可均, 1958: 2004)

安身是为了更好地让人们崇尚德兴, 创造美好的社会风气。一个人如果能保存他的本心, 修养其善性, 坚守信仰和追求, 不断提高人文修养, 终能达到安身之境界。总结, 潘尼因所身处的时代局势再加上他富有正面的人格, 让其有机会接触并吸收儒家的思想, 对于人品他讲究安身立命之道, 要求人们以守正保身为安好, 张溥对于他的人品态度给了正面回应, 说道: “至今颂闲居者, 笑黄门之乾没, 读安身者, 重太常之居正” (张溥, 1961: 130), 再批评潘岳后, 称赞潘尼遵循正道。

第五章 结语

从张溥的背景与其文学思想来看, 除了朝中的腐败让张溥的思想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外, 前人对汉魏六朝文学的忽略也激励了张溥复兴汉魏六朝文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希望通过复古运动来改善这种士风。张溥尊经重史, 注重一个人的道德行为, 提倡人们应该学习古人的良好精神, 并且借鉴历史从中吸取教训。另外, 张溥处于晚明时期, 在那个时代如从公安派以来, 人们都是向往革新运动, 张溥对于前人过于强调革新表示反对, 认为这与古人的思想主张存有脱节。于是他便大张旗鼓地选择了复兴汉魏六朝文学, 后来也就有了《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的出

现。

首先，通过对《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的文本分析，我们能了解张溥的人物批评倾向及文学思想。张溥的人物批评倾向在于人品在先，文学其后，而其中特别崇尚道德品行极佳的人物。再者，从对“二潘”文学成就上及二人自身人格的研究，能看出张溥的文学思想及其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张溥的人物批评倾向也显示出了他的政治理想和抱负。而张溥会将潘岳与潘尼选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的文人之一，除了表现出张溥一种文学继承的观念，也是因为潘岳的文章在西晋时期掀起了一股作用，尤其是他的哀诔文、悼念诗赋更是受到无数人的追捧；而潘尼的文学成就虽然不如潘岳，但是其人格却符合张溥的标准，其文章有些也涵盖了张溥的文思想，符合张溥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因此选此二人进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也就成了理所当然。

接着，便是张溥对于“二潘”之比较，从中可看出张溥的比较批评分别从品行差异、生活际遇的对比，及文学成就的比较来展开。在文学作品的比较中，张溥选择了陆机与潘岳进行对比，因两人在文学成就的程度旗鼓相当，更能突显出潘岳的性格。而在生活际遇上的对比显然是拿“二潘”之比较，两人无论在性格上和文学成就都有落差，因此能表现出双方自身的特点。而张溥对两人进行比较后，即有继承前人传统上的批评方法，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

最后，在潘岳与潘尼的文学作品评价中，张溥对于潘岳的文学成就，尤其是其擅长的哀诔文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但是张溥始终也没有跳脱出前人对潘岳之评价基础上。而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潘尼，其对品人的叙述文章强调雅正及安身立命之道，

且还忧时忧国，向往理想的社会，这也符合了张溥的文学思想。

参考文献

（一）参考书目：

1. 陈书录（1996），《明代诗文的演变》，华东：江苏教育出版社。
2. 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等著（1996），《晋书》，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
3. 蒋逸雪（1982），《张溥年谱》，齐鲁书社出版社。
4. 刘勰著，詹鍈义证（1999），《文心雕龙义证》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

5. 吕慧鹃、刘波、卢达编（1997），《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6. 王运熙、顾易生编（2007），《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第五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7. 徐公持（1999），《魏晋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8. 许文雨（1983），《钟嵘诗品讲疏》，四川：成都古籍书店出版社。
9. 严可均（1958），《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
10. 永瑢、纪昀等著（1965），《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
11. 张溥著，殷孟伦注（1961），《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社。
12. 褚斌杰（2005），《中国古代文体学》，台湾：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社。

（二）期刊

1. 姜剑云（2002），〈安身而守正：论潘尼人生道路与人格精神〉，《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2年第二期，页45-46。
2. 孟晗（2013），〈潘尼作品论略〉，《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29卷第

一期，页 66。

3. 李江峰（2006），〈从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看张溥的文学思想，《唐都学刊》，2006 年第 22 卷第一期，页 4-5。
4. 张国星（1984），〈潘岳其人与其文〉，《文学遗产》第四期，页 34。
5. 钟涛（1994），〈张溥文学思想管窥〉，《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 年第二期，页 78。

（三）学位论文

1. 高胜利（2012），《潘岳研究》（未出版之博士论文），扬州大学，江苏。
2. 贾静静（2008），《潘尼研究》（未出版之硕士论文），扬州大学，江苏。
3. 柯昌礼（2006），《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中的批评人物》（未出版之硕士论文），上海师范大学，上海。
4. 陆岩军（2008），《张溥研究》（未出版之博士论文），复旦大学，上海。
5. 缪定中（2007），《潘尼及其诗文研究》（未出版之硕士论文），华南师范大学，广州。